

小议典籍翻译

詹宇灵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641)

摘要: 中国典籍英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同时, 由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语言文字的高语境特征, 给翻译带来了语义、情境和文化等方面的翻译困难。本文从典籍翻译译什么, 怎么译的问题入手, 探讨典籍翻译的困难以及“合作翻译”“异化翻译”以及“碎片化”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典籍翻译; 语境; 翻译策略; 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78(2016)01-0064-03 DOI: 10.3969/j.issn.1674-5078.2016.01.018

一、典籍翻译的定义及背景梳理——译什么

(一) 什么是典籍翻译

定义和分类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基础, 本文在思考典籍翻译的其它问题之前, 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本身及其范围, 也就是说, 典籍翻译到底翻译什么? 《现代汉语词典》将汉语典籍解释为: “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 也泛指古代图书。”《辞海》详细解释为: “国家重要文献。《孟子·告子下》: ‘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 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由此观之, 中国典籍狭义上是指国家制度和法典, 广义是指古代(中国清代末年以前, 之后即为近现代)重要文献、书目等。

本文所讨论的典籍, 偏向于承载中国古代文明的小说、诗歌、戏剧、哲学、论著等。这一部分文献的翻译, 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和机遇

中国的翻译史经历了4次大的高潮, 第一次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翻译方向是外译汉。一些著名的高僧出于宗教目的, 将印度等地的佛经由梵文翻译成中文, 也有小部分将中国的《老子》及部分史学著作翻译为外文。第二次发生于明末清初, 主要是外国在华传教士将一些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并传入中国, 内容涉及数学、科技医学等。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 诸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将西方大量的著作包括文学等, 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流行开来。前三次的翻译高潮, 都是“西学东渐”的模式, 以外译汉

为主。而目前, 我们正身处翻译历史的第4次高潮, 也就是全球化时代全方位的、职业化的翻译高潮。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引人注目, 产生了对中国文明更深入了解的需求。纵观现代职业翻译市场, 即使非应用翻译只占不到3成比例, 却承载了中国文化传播和延续的使命, 这是关系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问题, 是增强中国在国际地位话语权的重要支撑。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 中国文化正在以崭新的面貌向世界进发。从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开始, 经历了传教士为主对《大学》《论语》的翻译, 再到后来中国自己的翻译家将反映中国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的儒家经典及其它小说戏剧等翻译成外文, 一直到《中华大文库》英文版系统性出版。中国的典籍外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成为当代译者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和英译策略——怎么译

中国典籍翻译几乎覆盖了英文、法文、西班牙语等语种, 但从数量和深度而言, 主要的外译语言依然是英文,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二战后英美国家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广泛影响。总而言之, 本文在讨论典籍翻译的问题和策略时, 关注的是中国典籍的英译。

(一) 中国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

中英文之间的差异, 是中国典籍外译困难产生的根本原因。中文为意合语言, 英文为形合, 中

收稿日期: 2015-11-05

作者简介: 詹宇灵(1985-), 女, 广东湛江人, 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

文惯用虚实结合,而英文讲求具体形象。中国古代文献大部分以文言文创作。德国语言学家洪堡评价中文时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这种美表现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关系,以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所说的中文抛弃了的那一切无用的关系,在将古代汉语翻译为外文时,译者需要经历一定程度的复原。

中英文之间的差异,总结起来可以表述为语境的差异。中文尤其是古典中文,被视为高语境语言,而英文则属于低语境语言。我国语言学家胡壮麟把语境分为3类: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语言语境是指一个词、一个短语、乃至更长的话语及语篇前后的内容;情景语境是指与交际有关的人物、场合以及时间;文化语境是指语篇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经济、宗教和政治背景。从这3个方面出发,典籍翻译的问题可以归结为3个对应的失真问题。

1. 语义失真

翻译的基础是理解,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英译,基于译者对文献的理解。而中国古文尤其是哲学性著作具有深度的提示性,也就是说,作者往往在阐述一种引发读者不同理解和思考的提示,而这种提示是很难翻译的。任何译者的翻译,首先都将自己作为读者,得出一种自己的理解方式,再进行翻译。而原文往往还具有其它层次的含义,因此出现了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道家经典著作《道德经》,是深富提示性的哲学性著作的典型代表。一个“道”字,就出现了“Tao”“Dao”“Road”“Universe”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究竟哪个正确,似乎最终归于对哲学的理解,答案莫衷一是。再比如,2009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英对照本《论语》中《论语·子罕篇第九》开篇中“子罕言利与命仁”,孔祥林译为“孔子最少言者莫如利,最多赞者莫如天命与仁德。”而英译本的译者 Legge 将原文译为“The subjects of which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were —— profitableness, and also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perfect virtue.”由此可见,两人对原文的理解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解读。

2. 情境失真

语境高低的差异,除了在语义上造成翻译问题外,在原文的情景再现上也出现了困难,这在诗歌翻译中尤为凸显。中国诗歌是中文追求意境、

形式凝练和音乐之美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诗词在很多时候是用以配合音乐表演的,韵律和节奏的美感构成了欣赏诗歌的重要部分。但在英文翻译时,很难同时兼顾语义和音韵。中文的诗歌中,重复是一种美感的体现,而英文忌讳重复,导致了典籍外译时情景语境翻译的困难。

3. 文化失真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的过程实质上并不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文化交流。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形成了强大而独特的文明体系。熟知自己的文化习俗和某些典籍蕴含的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若在翻译当中不顾及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外国读者会觉得不知所云。用典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修辞手段之一,文人学者皆以能引经据典为傲。作者是基于读者处于同一文化语境的假设而采取这样的修辞手段,但是在翻译中,就会给译者带来困难。有的译者直接在译文中采用补偿的方式,将典故的背景信息补充,也有的译者采用注释的方式。注释是一种较为直观且有条件的处理方式,许多译著的注释远远超出原文字数。以国外的《论语》英译为例,几十个英译全本几乎都有大量注释,有些注释的篇幅超过正文,如 Simon Leys 的译本正文翻译共 98 页,注释则多达 105 页。国内的《论语》英译本也越译越厚,2011 年出版的吴国珍译本达 560 页之多。由此可见,作为中国重要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若要真正传达原文的文化语境,单纯的翻译已远远不够。

(二) 中国典籍的英译策略

为了解决中国古代典籍英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可以从对源语言语境的理解着手。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需要先结合历史及文化背景将典籍翻译为现代汉语白话文,再按照汉语白话文的意思翻译成英文。这也就是说,典籍外译要经历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译者理解源语言的过程。当下译者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往往借助以往的文史学家对典籍的注解。千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哲学家和其他文史学家,对《论语》《道德经》《庄子》等的注、疏、译、释、考,不胜枚举,完成了古籍翻译的第一步。当代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往往借助于前人的这些成果。确切说来,本文认为当代译者可以采取以下翻译策略。

· 学术探讨 ·

磨
宇
灵
小
议
典
籍
翻
译

1. 合作翻译

合作翻译是指,将典籍翻译的全过程看成一条生产流水线,每个阶段由最有效率的人员操作。也就是说,在语内翻译阶段,采用中文为母语的译者同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风俗文化学者和哲学家合作的策略,确保对原文的解读;在语际翻译阶段,采用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与中文为母语的译者进行衔接,在保证原文理解准确的同时,确保译文的可读性。这样合作翻译获得成功的例子不在少数,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时,就是与徐光启合作。也有例子比如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其实是不懂外文的,其翻译的大部分著作,是由当时他留洋海外的朋友们口述故事,他进行意译著作而成的。

2. 异化策略

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归化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内容。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如将中国当代文学家莫言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葛浩文,就是采用英美人喜爱的表达方式,使莫言的作品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和肯定。但是中国古籍同莫言的当代文学有着巨大的差异。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适宜才用异化翻译的策略,也就是说,“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让译作具有译作的特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字符。可增强典籍标志的符号性和翻译的严肃性,不仅有句子的表义功能,而且可以从中透视到词汇的内涵。

3. “碎片化”翻译

以往对于典籍的阅读,往往用连续的时间以研读的方式完成。而现在采取这种阅读方式的除少数专业研究学者以外,大多是“碎片式”阅读。

这就需要中国典籍适度采取“碎片化”翻译模式,即不需要将典籍进行整本的完整翻译和注释,而是采取摘译、改译,如新加坡配图版的《论语》英译版本。

三、结语

目前,正是中国典籍外译的大好时机,但由于中国文化与文字的博大精深,加之肩负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为典籍当代译者带来不小的挑战。作为当代译者,应该本着认真严肃的翻译态度,同时又要开放思想,放眼世界市场,适应当今典籍外译的潮流。

参考文献:

- [1] 杜泽逊. 文献学概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 [3] 黄国文. 典籍翻译: 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J]. 中国外语, 2012(6).
- [4] 蒋坚松, 彭利元. 文化语境与中国典籍翻译——关于一个研究课题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06(2).
- [5] 李长江. 从目的论角度析典籍翻译的归化策略[J]. 时代文学, 2009(4).
- [6] 林元彪. 走出文本语境——“碎片化阅读”时代典籍翻译的若干问题思考[J]. 上海翻译, 2015(1).
- [7] 王宏印.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 概念、理论与技巧[J]. 大连大学学报, 2010(1).
- [8] 赵长江, 刘艳春. 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现状、研究问题及未来展望——关于一个研究课题的思考[J]. 燕山大学学报, 2014(4).
- [9] 朱维焕. 国学入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Venuti L.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ZHAN Yu-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s faced with great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 are diversified with a characteristic of high contex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ranslating the meaning, background and culture. Starting with what is Chinese classics and how to translate Chinese class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such as “joint-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and “fragment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contex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